



【说法不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决策失误风险。



【言无不劲】
各国都在改革，大家要建立新的网友关系，让互联网世界更安全，更美好。



【广深今谈】
官方曾确认广州南沙区将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时至今日,仍无下文。



【庄周梦蝶】
如果不幸获得擢升，办公室里每天捧着茶杯逛论坛的老同志便是当年轻公务员的明天。

运用法治思维推进京津冀一体化

刘武俊

“京津冀一体化”已经成为舆论热议的热门话题,甚至规划尚未出台,楼市已经预热火爆涨声一片。笔者认为,京津冀一体化既需要政策引导,同时也需要立法促进和法治保障,京津冀一体化其实也是立法同行、立法推进和立法保障的法治化。

京津冀一体化的实施必然伴随着产业、户籍、公共服务等方面一系列重大决策,并会出台一系列设计三地区域内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按照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必须实现公开化、程序化和民主化,必须保证相关决策信息充分公开,发动公众广泛参与决策和监督决策过程,要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公众的意见,

必要时可举行决策听证会和上网征求民意,坚决避免搞闭门造车。涉及京津冀一体化的任何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都应该公开透明,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决策,在正式出台前要尽可能先搞民意调查广泛征求民意,政策出台后要及时回应公众质疑,必要时适时调整政策。建议有关部门专门制定“京津冀一体化重大行政决策条例”,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健全京津冀一体化行政决策的程序保障机制,将京津冀一体化重大行政决策纳入法定程序的轨道,坚决避免个别领导拍脑袋式决策、政策朝令夕改或部门利益垄断式决策,同时要健全重大决策的问责机制,依法严格追究重大决策失误、以个人意志或者部门利益干扰科学决策以及决策过程中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

备受关注的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不应仅仅是政策性文件,还需要通过立法上升为权威的法规,如可以由国务院出台专门的“京津冀一体化规划条例”,京津冀三地可制定地方性法规性质的一体化规划实施办法。重视一体化规划立法,可以避免一体化规划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朝令夕改,不受行政因素和京津冀领导班子更迭的影响,使得一体化规划的实施更加有力和顺畅。

京津冀一体化的重心之一是促进经济协作和产业发展,既要出台有关产业扶持政策,也有必要制定专门的“京津冀经济协作和产业发展促进条例”,以法规的形式为京津冀经济协作和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公共服务一体化是京津冀一体化

的题中应有之义。京津冀一体化,意味着北京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某些公共服务将要转移到周边的冀津地区。事实上,近年来河北已经在逐渐承接北京的部分医疗、教育包括高教资源的转移,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启动,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公共服务资源的重新配置将进一步加速。加强公共服务一体化立法,适时出台“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条例”,将从法律层面有效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

京津冀一体化亟待加强联防联控治霾的专项立法。国务院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将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较严重区域进行重点防治,并探索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建议将京津冀联防联控治霾的立法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抓紧时间对就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联防联控进行调研,尽快制定出台“京津冀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条例”,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京津冀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的协同机制,依法明确京津冀三地在联防联控大气污染方面各自的职责范围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未雨绸缪重视京津冀一体化立法工作,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法治进程,有利于将京津冀一体化纳入法治轨道,实现政策引导和法治保障的有机统一,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京津冀一体化的决策失误风险和减少一体化实施的障碍,同时也可以为国内其他地区的类似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法治范本。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斯诺登，国家公敌还是网络英雄？

李劲

2013 年,发生了很多事,但从对全世界的影响而言,斯诺登的事儿最大,影响深远,余韵不绝。2014 年 2 月 19 日,斯诺登当选苏格兰知名学府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校长是一种名誉,由大学生投票选举,斯诺登欣然接受。此前,他还获得了褒奖情报界正直人士的“萨姆·亚当斯”奖,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2013 年 6 月 9 日,美国前特工人员斯诺登在香港曝光:2007 年始,美国政府开展一项秘密情报监视计划,叫作“棱镜计划”,这是美国总统情报的最大来源,参与该计划的公司包括多家赫赫有名的互联网公司,比如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YouTube 以

及苹果等;美国自 2009 年以来就开始潜入世界各地政府官员、企业以及学生的电脑系统进行监控。斯诺登这个曝光震惊了世界。事实上,斯诺登曝光出来的内容只是冰山一角。有人期待他说出更多,有人则恨不得杀他灭口。

“棱镜计划”曝光事件发生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政府的监控项目在安全和隐私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并由国会和法院密切监督。奥巴马说:我们不能在保证 100%隐私的情况下保证 100%安全。

冷战之后,美国一枝独秀,当上全球霸主,很牛。“911”事件后,美国携着悲情不宣而战,开辟了“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新战场:网络战场。针对一切潜在的敌人或对手:公民、组织或国

家。美国是互联网技术的发源地,在网络战中占尽了资源和优势,比军事优势更强大。斯诺登事件让各国看清了美国的价值观,谁是美国的自己人,谁是普通朋友,谁是竞争对手,谁是敌人。敌人必须监控,朋友也要监控,国内更需监控,差异表现在不同监控方案上。

美国前总统里根有一句名言:你让我信任你,就得让我监听你。美国的网络监控系统远远超出了反恐的需求。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在最高机密遮蔽下,在没有有效监督下,怎么能确保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边界、不同政治利益的边界、不同民族利益的边界、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之间的边界,都被很好地划分?现在,不管是美国的朋友,还是美国的敌人,都在忙

于网络国防,在互联网的世界中建造自己的城池、堡垒、战壕和武器。

全世界通过数千年的血腥战争,逐步固化了国家的边界,实现了和平,互相贸易,在商业规则下进行竞争。但互联网时代到来,带来了新的文明冲突。经济学家喜欢用“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在亚洲激起一场风暴”来形容经济的全球化属性,其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小概率事件,很难发生,借助互联网的力量,风暴却可以瞬间发生。一百年前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叛逆也不会带来比斯诺登更大的影响。开放的互联网成为推动社会改变的力量,它让好的国家更强大,同时让坏的国家更危险,阿拉伯之春的殷鉴未远。

有一句西谚:“穷人的草房,风可

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个人的财产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现在,我们在网络世界中建起自己的空间,如同一座小屋,以为是自己的家,是私密的,风、雨、国王都不能进,实际上,风雨不能进,很多人可以随便走进来,甚至外国人,坐在幽暗的角落,看着你,或走过来,copy 你的网盘,这岂不令人烦恼?

斯诺登事件踢破了一个真相:在互联网时代,国家无所不知,所以他成了国家公敌,还好国家在这个时代并非无所不能,所以,他还活着,领大奖,见爸爸老斯诺登。美国在确定之后,正在改革,各国都在改革,大家要建立新的网友关系,让互联网世界更安全,更美好。斯诺登,真英雄!

(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

官员财产申报漏洞岂止“表格不够”

今纶

广东官员曝财产申报漏洞,房产信息难如实上报。有官员告诉记者,申报表格中有一项要求申报房产信息,表格仅设置 3 到 4 行可填住房数量,但他的住房并不止三四套,后来按照领导指示,只填了一处。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位官员很矫情,但是制度存在漏洞、存在需要改进的细节则是事实。广东省要求官员填写财产申报表,以前只涉及副处以上官员,从今年开始,副科级以上官员也被纳入登记的范围内。这貌似是进步之处,但是进步的意义实在有限。从源头上来说,因为表格设置的问题以及其他技术性问题,已经让财产申报大打折扣,官员们自然深谙其妙,于是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再打个折扣。如此一

来,财产申报制度的震慑力已经大减,大概只剩下装饰的意思。再加上中国内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不对外公布,那么,官员对此就更不放在心上,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那么,有没有不对外公布也可以起到震慑作用的例子,确实有,新加坡就是如此。新加坡每一位公务员在被聘用时,要填写财产清单,到法院设置的公证处接受审查并由指定的宣誓官签名。每年 7 月 1 日,则须填写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对每份财产申报表进行审核。如果发现现有财产来源违法问题,就立即交送反贪污调查局调查。不过,新加坡的所谓“不公开”是建立在整个反腐体制非常廉洁高效的基础之上的,离开这个体制,这种“不公开”肯定会成为腐败的藏身之地。

相比之下,中国内地显然还不具备如此完备的体制,因此,向社会大众公开其实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方向。通过公众施加的舆论监督压力加速清除腐败,理应会取得显而易见的效果。前述新闻就佐证了笔者的判断,另外,有谁听说过中国内地官员因为申报财产不实被处分甚至被开除公职的吗?笔者孤陋寡闻,至今未见一例。这才是症结所在,既然只是游戏,官员们自然不会当真,有 10 套房子也写成只有一套,其实是最理性的选择。

类似“表格不够填”的问题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改进在短时间内解决,比如可以选择网上填报,也可以“另外附纸填写”。技术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填报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不属实应该怎么办,执行是否能到位,以及如何迈出

对大众公开这一步。

广东比邻香港、深圳、广州等城市更是经常喊出“向香港学习”等等口号,那么,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何不更多地学习香港呢?香港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已经超过 40 年,从表格制作到后期的公开程序,都有现成模板可以复制。任何入登录港府行政会议的官网都可以看到梁振英的财产申报结果。媒体 2012 年 8 月的报道显示,港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拥有 8 处房产居于榜首,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拥有 6 处房产排名第二,未见市民因为他们房子多而痛骂他们贪腐。这就是制度的力量,这种制度也已经内化为一种日常的管理。香港的廉洁自然不仅仅依赖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包括廉署在内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保证了

其能够形成体系正常运转,但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确实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相比香港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的稳步迈进,内地仍然是蹒跚学步阶段,这个阶段是否已经太长?诚然,内地与香港有某些不同,现实情况确实也有太多需要妥协的因素,但是推进试点总是可以吧。去年年初,官方曾确认广州南沙区将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时至今日,仍无下文,也是一种遗憾。

官方无需重申“香港 16 万公务员中,只有 3100 多名在重要岗位上的公务员要进行财产申报”这一类常识,公众更愿意看到的是,内地各级政府在官员财产申报之路上的扎实推进和细节、程序执行到位。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公务员的皮子与里子

周凯莉

在狂飙突进的大时代,所有个体都是渺小的存在,就像走在北京的王府井,人流摩肩接踵,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不断地推动你往前走,可恍然回首,却不知道竟是为了什么在奔波劳碌。

想来我的朋友七公也有类似的感受。在南国的阳光下,他喝着一杯摩卡,轻描淡写地告诉我:“我辞职了。”乍听此言,我是惊讶的,毕竟 30 刚出头的他在热门机构的公务员系统耕耘了近 10 年,具备了一定的晋升条件。但稍加琢磨,我便释然了,从小浸淫在小城市机关大院里的我,对公务员这一职业的无奈和心酸毕竟深有体会。

谈话的末尾,七公激烈地反问:“扒下公务员这层皮,你还有什么?”这

一问题大概也是许多年轻公务员午夜梦回之时的扪心自问吧。但真正下决心“扒下这层皮”的公务员,可谓少之又少,以至于某证监局局长下海办了一个农场,也成为爆炒一时的热闻。

经历过公务员考试的人都知道,相比高考,这是内容更为繁琐、竞争更为激烈的考试,千军万马走一条摇摇欲坠的独木桥。特别是在经济大环境欠佳时,这一条独木桥在公众看来,更是闪闪发光的“康庄大道”。能够考进公务员系统的,大多是这个国家的精英人士,他们不仅具备光鲜的学历,也具备和这个体制相匹配的思维模式。

有幸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年轻人,首先要做的是调试自己,收敛锋芒。我曾有一个潮男同学,毕业后在北京某乡下当乡长,他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

情,就是告别时尚服饰,换上公务员的职场装,比如大背心、短袖白衬衫、黑色西裤以及米黄色夹克衫。在初入体制的几年里,除了具备特殊背景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公务员都必须忍受仅供糊口的低薪,当然,隐性福利也是存在的,只是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写材料、改报告,是所有年轻人需要忍受的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而一些官场恶习,比如喝酒、迎来送往等等,也是避免不了的。出身、后台、机遇更是硬通货。若是情商不够,可能导致很长时间都无法融入职场文化,升职往往遥遥无期,内心的煎熬更是不足为外人道。所以,有调查称,中国的公务员是压力最大的职业之一,罹患抑郁症、躁狂症的比例相当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身份

似乎对实现个人价值增益不多。撇开灰色地界不谈,从经济价值上来讲,依靠本职收入,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要实现财务自由基本上为空想。从社会学上来看,个人价值的实现指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而个人价值的源泉在于个人的创造性活动。以此为尺度来参照,公务员在系统里所做的事情,比如写材料、改报告,乃至参与制定国家方针政策等等,的确让他们在体制内得到了肯定,并为体制的完善做出了贡献,但对个人价值的提升来说,似乎并不存在显著的效果——从撰写充满特定语言规则的材料中得到多大的裨益呢?对此大家心知肚明。不难想象,十年后、二十年后,如果没有足够的才能和幸运获得擢升,办公室里每天捧着茶杯

逛论坛的老同志便是当年轻公务员的明天。

正如七公所说,看不到希望,是年轻公务员在当代最为现实的迷惘。在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系统里待久了,如同温水里煮的青蛙,有一份想出去看看的心,但似乎却失去了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室外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寻求安稳,是人性最本能的选择,失去了体制的庇护,扒下了公务员这一层皮,就等于失去了人生最初的设定,肉体与精神或将陷入双重的否定。不过,全盘否定总归是不理智的,在当下的中国,若论起妥协的技巧、平衡的艺术,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份职业能比公务员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学得更多!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